

兩岸發展史研究

第二期

《惲毓鼎澄齋日記》
所見清遺民的政治認同

林志宏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

《惲毓鼎澄齋日記》 所見清遺民的政治認同*

林志宏**

摘 要

透過最近出版的《惲毓鼎澄齋日記》，本文旨在說明京津地區清遺民的出處及心態。在清季時，惲毓鼎特別基於對新／舊政治與學術的想法，反對朝廷推動新政。這並非單獨的現象，許多遺民後來在民國均以此認為是清亡的因素之一。另外，身為忠清的遺民，日記中的書寫也反映出惲對清室的忠貞。最後，如果說日記是一種私密的自我解剖，那麼惲氏又是怎樣呈現對民國政治的想法，以及統治當局的互動？

關鍵詞：清遺民、惲毓鼎、日記、政治認同、心態

* 本文曾宣讀於「日記中的近代歷史」學術討論會（臺北：中國近代史學會，2004年10月16日），承蒙與會的陳永發、張力等教授賜正，謹致謝忱。

** 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 一、前言
- 二、對清末新政改革的批評
- 三、私領域中傳達的忠清認同
- 四、公領域的曖昧和模糊態度
- 五、結語

一、前言

與其他歷史資料相比，日記有時更能鉅細靡遺地掌握個人心態上的變化。特別是那些生前便已飽受爭議的人物，不論有意還是無意地想要保留資料，他們的日記頗可讓我們接觸到其內心隱諱的一面。甚至許多難以見容於當時社會的想法，經由日記裏直抒無忌，暢所欲言，或許從中也能窺知一二。關於此類「負面」題材的人物之中，本文所要談的「清遺民」¹即具備了上述的特色。

截至目前為止，傳世的清遺民日記數量尚難估計。就我個人粗略所見，大抵可分為兩類。其一是歷經整理、摘錄後出版的，像郭曾炘(1855-1929)《邨廬日記》、²袁金鎧(1869/70-1945/47)《傭廬日記語存》、金梁(1878-

-
- 1 本文所謂「清遺民」，係指1912年創建民國後，在共同的心理和行動基礎上，主張以恢復帝制、反對民國共和體制的一群人。他們容或思想態度和目標不一，可是因為懷抱對皇帝制度的眷戀，儘管身處民國，仍要歌頌君主；由於厭惡民國的共和政治，使得他們時時奔走聯絡，堅持復辟，希冀中興清室大業。當然，遺民追懷前朝、不仕新朝，此因為中國歷史獨特之政治文化，但對近代中國而論卻別具意義。因為從帝制轉型到民主共和體制，除了來自政治的因素外，文化方面的變動亦不能置身事外。民國以後忠於清室的遺民及其活動，從思想層面來看，其實涉及了複雜而多元的特色。
 - 2 此書乃郭則澐(1884/86-1947)摘錄，為民國二十三年(1934)侯官郭氏刊本一種，藏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根據葉祖孚(1928-1998)所言，另名有《過隙駒日記》，曾閱自謝興堯處。從葉氏的描述，該日記的內容遠較郭則澐所摘錄而出版的內容豐富，並且還有張伯駒(1897-1982)、許姬傳(1900-1990)等人的題跋。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葉祖孚文史散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頁161-162。現在全稿出版於：國家圖書館分館編，劉家平、蘇曉君主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冊72。

1962)〈遇變日記〉，陳曾壽(1878-1949)、陳曾植〈局中局外人記〉、《榮慶日記》、劉大鵬(1857-1942)《退想齋日記》、《鄭孝胥日記》、《那桐日記》等。³這些業已排印出版的日記，固然帶給我們研究和閱讀上偌大的便利，但相較起來，第二類以手稿影印方式來呈現的日記，仍佔絕大多數。舉例來說，像葉昌熾(1849-1917)《緣督廬日記》、⁴繆荃孫(1844-1919)《藝風老人日記》、胡嗣瑗(1869-1945)《直廬日記》、徐世昌(1855-1939)《韜養齋日記》等。⁵究實而論，兩類不同屬性的日記各有優劣。依據手稿影印出版的日記雖不易讀，然其中如有刪改情事，便可立即察覺和思量用意所在。並且，如同其他近代史資料浩瀚的情形一般，相信未經披露的清遺民日記應該更多。⁶

上述清遺民的日記，有些早為學界熟知，甚至已有學者據以研究、探討，成績斐然。不過，由於時間所涵蓋的內容範圍不一，其中幾部甚至更廣泛涉及整個清季民初時期，所以多數研究便集中運用在分析相關史事上，⁷

3 袁金鎧，《備廬日記語存》（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金梁，〈遇變日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輯13（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61年3月），為李世瑜整理；陳曾壽、陳曾植，〈局中局外人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輯19（北京，1961年9月）；謝興堯整理點校注釋，《榮慶日記》（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6年）；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國歷史博物館編纂，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北京：新華日記，2006年）。

4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此書另有王季烈的摘鈔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4年）可供比較。兩書最大差異是：原稿份量多，約有一百九十七萬一千餘字，王氏鈔本僅佔三分之一，並且「以傷忠厚者，皆節去之」，但經比對後發現，王氏私自竄改處其實不少。相關討論，參考江慶柏等，《中國版本文化叢書·稿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54-157。

5 李一華等編，《藝風老人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胡嗣瑗，《直廬日記》（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4年）；徐世昌，《韜養齋日記》（天津：天津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

6 承馮忠文先生告知，如許寶衡(1875-1961)的《巢雲籜日記》，目前後人還在整理之中。另外，鄒嘉來(1853-1921)的《儀若日記》及《遺盒日記》、劉承幹(1882-1963)的《求恕齋日記》、沈曾植(1850-1922)《海日樓日記》、沈曾桐(1853-1921)《百研齋日記》、金武祥(1841/42-1925)《金淮生日記》、恩光(1852-?)《潛雲堂日記》、聯祐《聯祐日記》、豫敬(1865-?)《豫敬日記》及王振聲(1836-1923)《心清室日記》等資料，只有少數研究者曾使用過。

7 例如被譽稱為「晚清四大日記」的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是瞭解清季民初政治與社會不可或缺的材料之一。此外，以《退想齋日記》為主要材料的則有羅志田、Henrietta Harrison、關曉虹等人。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中

絕少有深究他們在民國以後的處境。斯篇之作，主要想利用新近出版的《惲毓鼎澄齋日記》(以下簡稱《澄齋日記》)，⁸嘗試說明京津地區清遺民的出處及心態。

惲毓鼎(1863-1918)，字薇蓀，又字澄齋，晚號湖濱舊史，河北大興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曾歷任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國史館協修及總纂、講習館總辦等職，是清季為數不多的皇帝近臣之一。1910年，翰林院奏設憲政研究所，更以惲氏為總辦，參與新政立憲活動；但民國成立後，惲遂杜門不出。從他一生的經歷來看，《澄齋日記》可說是瞭解晚清以降政治社會不可多得的史料。實際上，很早便有人開始注意和利用這部收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日記，進行近代中國史的研究。⁹如今此日記被列為清史編纂文獻叢刊之一，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相信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釐清清季民初重要問題的機會。

此處想要討論的面向如下：首先，說明惲毓鼎在清季時代變局中的適應，特別是他對新/舊政治與學術的想法；其次，身為忠清的遺民，日記中的書寫如何反映惲毓鼎對清室的忠貞？最後，如果說日記是一種私密性的自我解剖，那麼惲氏既要表達忠清心態的同時，又該怎樣呈現對民國政治的想法，以及和統治當局的互動？

的近代社會變遷》，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鄉村士子——以劉大鵬、朱峙三日記為視角的比較考察〉，《歷史研究》，總期297(北京，2005年10月)，頁84-99。近年來，《鄭孝胥日記》也頗受注意和討論。湯志鈞，〈戊戌時期的鄭孝胥及其《日記》〉，《近代史研究》，總期91(北京，1996年)，頁17-29；栗林幸雄，〈清末における鄭孝胥の思想と行動：幕僚・官僚時期を中心に〉，《社會文化史學》，卷38(茨城，1998年)，頁61-78；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Henrietta Harrison, "Newspapers and Nationalism in Rural China 1890-1929," *Past & Present*, 166 (February 2000), pp. 181-204.

8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9 孔祥吉，《晚清佚聞叢考：以戊戌維新為中心》(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頁62-64。

二、對清末新政改革的批評

現存《澄齋日記》的內容，時間從 1882 年至 1917 年。除了當中 1899 年至 1903 年間日記已散失外，基本上惲毓鼎可說幾乎是每日必載。所幸當中散逸部分，關於涉及庚子拳亂史事，惲氏已有《崇陵傳信錄》可供參考。而《澄齋日記》所記載的內容，時間恰恰涵蓋了史家所謂近代中國的轉型期 (transitional era)，¹⁰ 許多影響深遠和重大的事件，均發生於此。如果我們細讀日記的話，也能夠感受到時局日感，對惲毓鼎而言，震撼乃逐步直逼而來。

跟其他清季的士大夫一樣，惲毓鼎本來熟悉的是傳統經史學問。尤其受到他的老師徐桐(1819-1900)影響，惲氏向來力主學習宋明理學，平日所讀的皆是王陽明(1472-1528)《傳習錄》、陸隴其(1630-1692)《三魚堂日記》一類修身典籍，就連自己想要編纂的書，也都還是以包括宋、元、明等諸儒語要為內容的《正修要錄》。然而這一切情況都在中日甲午戰後有了改變。根據日記記載，惲毓鼎最初在 1896 年向友人借閱薛福成(1838-1894)的《庸庵海外文編》，自此開始重視所謂「經國遠謨」，不但屢撰〈通商惠工〉、〈出使星詔滿路光〉等一類試帖，並擬上〈求才〉條陳。¹¹不過，儘管談論經世之學，究心洋務，惲氏卻相當反對同時漸興的康、梁等維新變法主張，認為「開口動言變法，斷難見諸施行，則亦徒亂人意耳」¹²，堅持「義理之學斷不宜廢」¹³。如此的態度也使得他到廿世紀初新政如火如荼展開時，更對改革事業並不抱持任何好感。

如今學界均普遍指出：清季接連推行新政改革，對近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甚至有人認為是開啓中國邁向革命之途的先聲。¹⁴

10 Hao Chang, "Intellectual Chang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1890-1898,"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2,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74-338.

11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111-114。

12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142。

13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160。

14 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惲毓鼎在《澄齋日記》寫下的見聞和體驗，同樣給我們大致雷同的印象。如1906年，他曾回顧思想和政治的關係，說：「甲午、戊戌、庚子三大案，實為朝政新舊關鍵，所繫甚大」¹⁵，這正是最為親切的目擊和見證。乃至到了1911年時，惲氏還更強調「亂亡之禍，早伏於十年之前」¹⁶。我們細觀日記中對新政的描述，發現惲其實給予相當負面的評價。

首先惲毓鼎感受來自政治影響下學術風氣的轉變。尤其新／舊學問交替之際，像惲氏這樣一位長期飽受傳統學問薰陶的士人而言，刺激自然不言可喻。有關新學的盛行，惲即在日記文字裏到處深表不以為然。例如，1903年初他偶到北京琉璃廠流連，眼見維新書籍層見疊出，頗感不耐，甚至對高唱女權的新書《女誠駁議》，直斥作者係「混賬少年，即義和團之變相也」¹⁷。對新學懷抱恐懼，最直接的衝擊便是教育的變革。另一項批評重點是有關科舉制的廢除。在廢科舉的呼聲高漲前夕，負責闡場試務的惲毓鼎即感嘆新學橫行，讓四書五經幾乎到達束之高閣的窘況。他表示如果還繼續如此的話，「聖賢義理不難棄若弁髦矣。學術人心，可憂方大。」¹⁸一位來自山東的平民跟他暢論時事，對推行新政下科舉之廢，學堂敗壞人才，表示風俗墮壞的意見，惲說「其識雖迂，而其言絕痛」¹⁹，顯然是認同其說法。不僅如此，對庚子以後政治及學術唯東洋是師、效習日本等各種風氣，惲毓鼎也屢屢傳達反對之意。²⁰他甚至還痛批留日學生文筆不通，係二張(按：張之洞[1833-1909]、張百熙[1847-1907])所誤，乃名教的罪人。²¹

新政帶來的不單是教育變革，同時也對其他層面引發若干效應。惲毓鼎曾於日記描述各項弊端，不管來自友朋見聞，還是他個人的觀點，特別顯見關注所在。其中，尤以財政問題為要。從《澄齋日記》經常讀到：為了能夠順利推動新政事業，地方官員紛紛要求百姓籌款納捐，於是引發民怨，造成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336。

16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576。

17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205-206。

18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221。

19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369。

20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250、276、286、461。

21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417、482、541、545、555、620、731。

各地聚眾抗官的情事，時而發生。在惲毓鼎個人看來，官方的這些舉措無疑係以藉辦新政為名，實際上卻毫無限制地聚斂擾民。他非常憂心這樣的結果將激成動亂之源，因此批評主事者袁世凱(1859-1916)、張之洞等人是「真罪魁也」²²。所以像 1909 年歲末，有人提倡要糾合民眾，集資償還對外賠款，惲毓鼎認為不過只是新政另一項藉口而已：

赴松筠庵同鄉會議國債事。談新政者，皆欲縮短洋債期限，合國民籌捐集款，於三年內掃數還清，斯誠愛國之忱，愚意則別有見解。舉吾民脂膏血產腹之削之，盡數以運往外洋而無以善其後，吾民將何以為生？還清愈速，民生愈困，終亦必斃而已矣。²³

伴隨新政而起的立憲運動，也是惲毓鼎極力抨擊的部分。在惲氏眼中，立憲的美名其實並無不可，可是問題是出在人弊，而非法弊；²⁴一旦朝臣出於私心，嗜利欺君，中飽私囊，使得立憲蒙上陰影，無異如「營私牟利之美事」²⁵。宣統年間他還反對朝廷以九年期限做為籌備立憲的決定，但觀點卻與時論迥異。簡言之，惲氏認為朝野共同推展立憲，未必足以達成國家富強目標。他反而追問眾口叻叻、缺乏策略的立憲舉措經費何在？並且不知將取資於何款？根據惲毓鼎的看法，倒不如致力於練兵與外交。²⁶

總之，身處北京的惲毓鼎並不支持新政。《澄齋日記》裏若干材料也可見到和他具有共同想法的人，絕非少數。²⁷猶有甚者，惲氏認為新政最終帶來的影響，係斷送了大清帝國的江山。在武昌革命事起不久，他歸納清室衰敗的原因，直言有所謂「亡國三妖」，分別是：

一東洋留學生，一新軍，一資政院諮議局。三妖之中，尤以第一種

22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241、301、317、489。

23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470。

24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320-321。

25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501。

26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504。

27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301、321、331、346。

為諸魔之母。²⁸

細繹「亡國三妖」之由來，無一不為新政下的產物。

有關《澄齋日記》中反映清季新政導致名器浮濫、人心風俗不彰等諸項憂慮，其實也是許多清遺民在民國以後論斷清亡的主要因素之一。譬如劉大鵬、胡思敬(1870-1922)和劉聲木(1878-1959)等人著作，便有類似說法，可引為同調。²⁹此外，升允(1858-1931)在 1913 年撰〈檄告天下文〉，也將清亡歸咎於推行新政，明言「奸人邪說」所致：「所謂奸人者何？孫文、袁世凱之徒是也。邪說者何？變法之類是也。」³⁰此下將進一步說明，《澄齋日記》中所見惲毓鼎身為清遺民的心態。

三、私領域中傳達的忠清認同

要探究歷史人物的政治認同，尤其想澄清是否具有所謂「遺民」心態，其實並非易事。除了來自個人形形色色的資料(如詩文集、書信)需加以反覆推證外，他人的判準也可做為主要瞭解方向之一。關於後者，「傳狀誌銘」一類文字書寫即是絕佳的素材，因為它正涉及到墓主在公共輿論中評價的部分。同時在某種層面上，撰作這些「傳狀誌銘」之人的政治傾向也頗值分析，因為極有可能是他們自我心理的投射。³¹

28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561。

29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903 年 2 月 23 日條，頁 120；胡思敬，《國聞備乘》（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 年），頁 180、189、210、213、219；劉聲木，《菴處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續筆》，卷 2，總頁 260、卷 4，總頁 312；關於劉大鵬和劉聲木的討論，參閱羅志田，〈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中的近代社會變遷〉，頁 184-187；林志宏，〈清遺民的心態和處境：以劉聲木《菴處齋隨筆》為例〉，《東吳歷史學報》，期 9（臺北，2003 年 3 月），頁 193-198；吳志鏗，〈清遺民的晚清記憶——劉聲木個案研究〉，李國祁主編，《郭廷以先生百歲冥誕紀念史學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315-353。

30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纂，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1913 年 6 月 23 日條，頁 1468。這裏所言「變法」，如同劉大鵬所形容，概指新政而論。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903 年 9 月 23 日條，頁 128。

31 相關說法，參閱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 12 月，頁 110-119。

然而，如果只從清遺民曹允源(1855-1927)所撰的惲毓鼎墓誌銘內容來看，³²似乎難以得知其遺民的身份。所以從公領域的角色而論，惲毓鼎顯然無法被認定是為忠清遺民。不過，隨著惲的私密日記出版，卻揭開了其中不為人知的一面。

《澄齋日記》描寫在民國後的內容，許多地方都足以顯示惲毓鼎個人的政治傾向，是以清室遺民自許。光是檢閱文字表面的敘述，日記便有多處言及對故國的思念，³³說明惲氏身為遺臣的想法。此外，平日的詩文登載在日記中，似也刻意想傳達自己的心態。如除夕作詩，惲尚謂「故國遺踪輕似葉，一年今夜重於山」³⁴；又如讀到甫完成的《宣統政紀》時，亦有詩言：「可憐一紙孤臣淚，留作前朝史傳材」³⁵。

至於對民國的態度，更處處表達了不滿的情緒。《澄齋日記》有關此方面的材料極多，俯拾皆是。譬如，惲毓鼎嘗譏諷「民國制度不一，事事可以自由，真古今中外所無」³⁶；聽聞通州軍隊叛變，他的內心既感竊喜，又說「嗚呼民國，真無安枕之日矣」³⁷；又得知山西教員歸途遭劫，則云「世途荊棘，可畏可嘆。前朝專制時代未聞有此也」³⁸，類似的字眼，行文充斥。至於遇到民國的國慶日，表示自己「觸處生感」，不願行經通衢大道，避見各種慶祝盛況，³⁹甚至批評民國政府是「橫征暴斂，更甚於前」⁴⁰，尤其反映遺民的心態。

除了以上明顯的敘述外，若能觀察文字中細微之處所透露的訊息，也可

32 曹允源，〈誥授資政大夫贈頭品頂戴原任日講起居注官二品銜翰林院侍讀學士惲府君墓誌銘〉，收在卞孝萱、唐文權編，《辛亥人物碑傳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1年），頁738-740。關於曹允源個人生平，參閱張一塵，《心太平室集》，卷3，〈清光祿大夫湖北襄陽荆兵備道曹君墓誌銘〉，收在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輯1冊8（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頁14-15。

33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588、611、622、624、630、638、668。

34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628。

35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655。

36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590。

37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605。

38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698。

39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706。

40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724、769。

以幫助我們確立惲毓鼎忠於清室的態度。比如日常儀式(rites)的進行，毋寧正刻畫和象徵遺民的自我認同。陰曆中的元旦，便為具有類似意義的特殊儀節。像在《澄齋日記》裏，每逢到了舊曆年的正月初一時，家家戶戶將行祭拜，惲毓鼎總會帶領家人，朝宮闕方向一同行三跪九叩之禮；此外，端午節日之際與兒子仍穿著昔日清室的衣冠行禮，⁴¹亦是顯例。有關清遺民重視儀式的文字紀錄，以往多半會在筆記軼聞中提到，⁴²如今我們卻能經由日記而得到印證。這些儀式背後代表某些難以言喻的情懷，儘管日記所記只是寥寥數字，卻有絕非尋常的意義。《榮慶日記》中也有正月初一日「上樓行九叩禮」的記載，⁴³《那桐日記》則是另一佐證。過去我們無從得知那桐(1865-1925)個人政治態度，但他的日記同樣顯現了身為遺民的處境。與惲毓鼎一樣，那氏每逢在正月初一當天有著類似的儀式，日記內則更標記「予告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前清遺老也」，⁴⁴藉示未忘故國。

在林林總總的儀式中，1913年隆裕太后(光緒帝[1871-1908]之妻，1868-1913)的逝世和光緒、慈禧(1834-1908)奉安梁格莊，最能反映遺民有意想要展現儀式的意義。許多清遺民的日記，幾乎紛紛記載這兩件事情；惲毓鼎日記也不例外，詳述其中活動的過程。關於隆裕之逝，《澄齋日記》中明白記載惲氏入宮內行禮的情形，「毓鼎滿腔哀憤，並為痛淚千行。既出猶嗚咽不能自己」⁴⁵，並提到「行禮不滿二十員，較之光緒三十四年，不堪回首矣」

41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596。

42 譬如，某則傳聞曾提到：廣東的清遺民汪兆鏞(1860-1939)，每逢陰曆元旦，必穿著朝衣向北叩恩；有一年恰巧同父異母胞弟、也是革命鉅子的汪兆銘(1883-1944)前來拜年，故意拉他一起叩拜。引自許金城、許肇基輯，《民國野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汪兆鏞與汪兆銘〉，頁 208。該文有若干錯誤之處；另據鄧又同所聞，1920年代的某年汪兆銘曾經返歸祖居祭拜。聽說當時汪還身著風靡一時的中山裝，祭拜時行三鞠躬禮。如此新派的作風頗令兄長不滿，結果汪兆鏞卻以嚴肅的態度向他說：「你在外搞甚麼我不管，但回家拜祖先應穿長衫，【行】三跪九叩」，要求採古禮進行。鄧又同，〈汪兆鏞與汪精衛〉，《春秋雜誌》，期 912 (香港，2002年1月)，頁 33-34。

43 謝興堯整理點校注釋，《榮慶日記》，頁 256。

44 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頁 865。除了袁世凱洪憲稱帝的 1916 年外，幾乎每年那桐的日記都會有如此類似的宣示。

45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632。

46，描述此一時彼一時的冷熱哀淒之情。又有北京的團體「社政進行會」，籌備開會追悼，惲毓鼎記自己親臨現場所見，「與祭者達八十人，足見吾人心理所同然。」⁴⁷還有清遺民吳郁生(1855-1940)、鄒嘉來等人，遠道自青島來謁梓宮，借圖相晤。⁴⁸至於奉安梁格莊的經過，先後共有兩天，日記內提到會見了各清室遺臣，儀式進行時「毓鼎伏地痛哭不能起，淚濕棕席。既興，與梁【鼎芬】前輩執手略話先帝傷心歷史，復失聲大慟。」⁴⁹番禺人顧臧(1875-1926)以諸生資格，專程由滬赴京來叩謁梓宮，惲氏以為其人「尤可敬也」；而趙秉鈞(1859-1914)奉總統之命派往致祭，穿著及表現得宜，惲說他「其心可嘉，遠勝孫寶琦、劉若曾輩岸然與舊主鞠躬，滴淚不落者。」⁵⁰透過這些文字的敘述，可知儀式進一步呈現出來個人自我認同，對清遺民而言別具意義。

另一項發展出來的儀式是傳統文人的詩詞唱和。《澄齋日記》對上述的兩次清宮祭典活動，都有賦詩茲以紀念。在初聞隆裕太后逝世不久，惲氏即作輓詞表示哀悼；⁵¹而對崇陵奉安的經過，日記中則陸續載有三首詩作。⁵²但我們不應將此僅僅視如簡單的舉措而已，相反地，對照若干其他資料，可以想見就算是遺民之間的詩詞唱和，實際上也充滿彼此認同的意味。這些詩詞，有些遺民會藉由刊物上公開，以示自己忠貞，⁵³而更多則是在私底下相互流傳。人在日本的羅振玉(1866-1940)，致信給繆荃孫時，便直言「大行太后之喪，海外孤臣，聞之摧痛。想長者同此情也。如有挽章，尚求賜示。」⁵⁴羅氏希望求獲他人挽章，目的顯見忠清情懷。與他一起的王國維(1877-1927)，則在隆裕太后逝世後不久，做有五言排律的輓歌辭九十韻。

46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632。

47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632-633。

48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634。

49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671。

50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671。

51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631。

52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672-673。

53 例如瞿鴻禨(1850-1918)、沈曾植等人在《庸言》發表隆裕太后哀詞，見〈詩錄〉，《庸言》，卷 1 號 11（天津，1913 年），頁 1。

54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1006。

因為王氏自己頗感滿意，並寄予同道指正。⁵⁵對那些私領域傳頌的詩詞作品，清遺民甚至會將之抄錄在日記中，亦屬於一種隱性的認同表現。例如，榮慶(1859-1916)嘗錄陳夔龍(1857-1948)哭隆裕的數首詩句，包括有「何圖陽九厄，先崇未亡人」等，而自己也寫詩紀之。⁵⁶秦樹聲(1861-1926)、冒廣生(1873-1959)亦與葉昌熾先後往來函示，競作輓詞以宣揚聖德。⁵⁷

無論描寫儀式或是詩詞唱和，這些透過日記中文字顯現出來的認同，娓娓道出清遺民個人的心態。即言之，如此隱性的「私我」，未必會公諸於世，可能只有像日記一類的資料才得以窺見。可是遺民心境除了「私我」的部分外，我們應該還需注意對公領域活動的態度，亦即「公我」之一面。

四、公領域的曖昧和模糊態度

Erving Goffman 對表演形式的說法，很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公我」/「私我」的區別。他提出臺前(front regions)與臺後(back regions)概念，將人們的日常生活與習慣，比喻為劇場上的表演。Goffman 認為，一位演員在臺前和臺後的表現可能截然不同。例如，演員們在舞臺前由於面對的是觀眾，自然要按照劇本，各自呈現劇中的角色；然而舞臺的後方則離開了觀眾的視線，那是一處演員得以控制的場域，因此可任意交談，甚至表現角色外的行為，無須考慮劇本的情境。在 Goffman 看來，兩種態度顯著的差別，其中頗有其行為語言及意涵：臺前的表演來自於臺後所精心設計，並且臺後的演員可以任意擺脫既定的角色安排。同樣地，人們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情況，也可作如是觀。⁵⁸Goffman 企圖說明人們在公/私不同場域裏具有雙重的處境與肆應。但他認為公/私也並非絕對劃分的，而強調那是人們自主性的體現，是一種「自我表演」(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自我表演」概念的劃分，某種意義用來說明清末民初之際的人物心

55 顧廷龍校閱，《藝風堂友朋書札》，頁 1018-1019。

56 謝興堯整理，《榮慶日記》，頁 224、226。

57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癸丑年二月廿九日(1913年4月5日)條，頁 7105-7107。

58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59), pp. 112-140.

態，亦能凸顯他們的模糊性。若以 Goffman 的說法，界定清遺民「公我」與「私我」的處境，可知兩者皆無法從單一面向來看待。譬如從書寫的性質而言，日記的體裁毫無疑問應是一項隸屬私領域的創作，目的用來發抒個人的心聲。但對清遺民來說，日記其實不見得全然係屬私密性「私我」的範疇；如同演員回到臺前展現「公我」一般，有時候私人日記可能還成爲聯繫同志的管道。像榮慶的日記中曾有將日記相示，並請友朋撰寫題跋的記載。⁵⁹這充分說明日記固爲個人私領域的作品，卻也具備某種「公我」的意涵。

惲毓鼎《澄齋日記》裏所呈現的「公我」，一樣值得來觀察他對民國的態度和變化。

首先關於新／舊曆之使用。民國肇建後不久，臨時政府公佈使用陽曆，這項命令促使曆法充滿政治的意涵。⁶⁰反對新曆，緬懷舊曆，幾乎被認爲是反對民國的清遺民共同持有的心態。如果我們翻閱人在上海、且自言「民國乃敵國」的鄭孝胥(1860-1938)，或是傾心清室的羅振玉，甚至是身處太原的劉大鵬日記中內容，都可以發現他們均不喜新曆，仍沿用甲子干支紀年。⁶¹而民初曾有首對聯是這麼寫著：

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⁶²

59 謝興堯整理，《榮慶日記》，頁 242、262。

60 曆法使用除有受命改制的政治意涵，更將王朝天子的正當性凸顯出來。漢武帝的太初改曆即是最著名的例證。新井晉司，〈曆法の發達と政治過程：漢代を中心に〉，《東方學報》，卷 62（京都，1990 年），頁 31-67。關於民國的新／舊曆問題，請參考 Henrietta Harrison 的討論。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65-71。又如《申報》(上海)，1913 年 2 月 15 日，〈自由談話會〉云：「論者謂改用陽曆，商人莫不關意，不曰頑固，即曰反對民國，斯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矣」，尤可說明當中政治意涵。

61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纂，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1912 年 3 月 6 日條，頁 1456。甚至直到 1930 年，鄭孝胥還說：「黨人禁用舊曆，而買時憲曆書者沿街皆是，此真所謂民意。」中國歷史博物館編纂，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1930 年 1 月 29 日條，頁 2268；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繼祖審訂，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年)，頁 135；劉大鵬，《退想齋日記》，頁 199，類似之例，頁 175、177-178、190。

62 梁申威主編，《民國名聯》(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266。

聯語顯見民國建立以後種種的分歧和混亂，時人便嘗形容所謂「舊民心理，此足代表」。⁶³所謂「舊民」，不必然泛稱反對民國之人，但清遺民的確對使用新(陽)曆頗有微詞。

可是若進一步細究，清遺民面臨曆法問題，未必完全呈現一致的態度。以《澄齋日記》所見，1912年以後惲毓鼎雖仍以舊曆來標示日期，可是卻也夾注新曆，自言是「為對於外人酬應計也」⁶⁴，可以想見惲的內心頗感掙扎。不過大致說來，在改制之初，惲氏時常非議民國政府的決策過於輕率。日記提到他認為新曆不符傳統節氣，且民眾仍襲舊慣，只有苟且因應。⁶⁵除了諸多憤懣及怨懟外，惲毓鼎對曆法的使用並非如人想像那般完全堅持。這樣心態的呈現，或許和接近政治核心有關，是身處京、津遺民的共相。例如，在天津頤養天年的榮慶，日記即是採民國紀元和舊曆同時並用(如記：民國五年丙辰正月初一日)。至於那桐的個案更饒富趣味。本來民國建立後，那氏說他自己「遵照臨時大總統袁通告，改書陽曆」，並列陰曆日期；然而1917年7月2日至11日張勳復辟期間，日記卻又私自改回陰曆，⁶⁶足見無所堅持。

惲氏等三位清遺民對曆法的態度，可以瞭解「公我」/「私我」之間，絕非不可逾越；不僅如此，遺民自我本身對認同的意涵，也非單一的因素所可判定。《澄齋日記》內顯示出惲毓鼎在「公我」的層面上，有許多時候並非完全屬於一位身為遺民所應有的行為，當中可能充滿無奈，或者另有理由。

類似對曆法的態度，是關於剪辮易服。這項深富政治意味的舉措，歷來也得到研究者注目。⁶⁷惲毓鼎個人心境的變化，亦值得留意再三。他剛開始

63 王錫彤著，鄭永福、呂美頤點注，《抑齋自述》(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83。

64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578。

65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590、596、607、677、713。

66 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頁709、850-851。

67 吉澤誠一郎，〈清末剪辮論の一考察〉，《東洋史研究》，卷56號2(東京，平成9年9月)，頁117-151；陳生璽，〈清末民初的剪辮子運動〉，《中華文史論叢》，輯61(上海，2000年3月)，頁87-118；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p. 30-40.

時先是表示反對(如南京有人攜帶剪刀迫人截辮，稱其「如飲狂藥」)⁶⁸，而後決定束髮改作道裝，⁶⁹最終則並不堅持。日記中還提及自己剪辮的緣由始末：

赴青雲閣理髮處剪髮。此辮與我相守五十年，一旦截之，不無戀戀。唯上流社會人俱已濯濯(唯商界中人尚有存者)，余既不能杜門自守，不免馳驟於酌酢場中，日受刺激，只可降心從眾矣。⁷⁰

這時為1912年5月21日，距離清帝遜位尚不久。如果對照許多清遺民向以不改正朔、不棄髮辮、不變衣冠來明確表示自己反對民國的話，惲氏的作為顯然要被看做是缺乏堅定信念的人了。但需注意的是這段引言最後說「余既不能杜門自守，不免馳驟於酌酢場中，日受刺激，只可降心從眾矣」，可知處於「公我」的角色，人在北京的惲毓鼎仍不免要隨波逐流。

如此「公我」的處境，最可顯現在對袁世凱的態度上。《澄齋日記》描寫對袁氏的看法，其實正面的肯定多於負面。前面提過，清亡前夕惲氏素不喜袁藉新政謀權。而1913年11月袁世凱解散國民黨，惲稱袁氏性格深沉，形容「其大本領則在真能沉得氣住，無事不引滿而發。余自問萬不及也。唯深沉始能擔當大事」⁷¹，內容是既褒且貶，兼而有之。可是到了1915年，北京政治圈有改共和為君主國體之議，時人謂袁世凱頗有稱帝意圖，令人意外地是惲毓鼎竟力表贊成。據日記1915年9月2日條載：

京兆二十縣呈遞更定國體請願書，推余領銜，而王鐵珊、金筱山、李丹孫次之。余于共和國深惡而痛絕之，況總統更替必爭，爭則必亂，吾儕將永無安業之時。改共和為君主，與吾衷固非次謬也。

72

68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579。

69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589。

70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592。

71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666。

72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741。

可以推知仇視民國共和體制，同意更定國體，係促使惲毓鼎決定改事二姓的主要因素。不久惲即接受了袁世凱的授職和任命，自言「寡婦再醮，自此始矣。」⁷³以後袁氏稱帝、行君主立憲等種種作為，惲氏皆力表贊成，⁷⁴乃至撤銷帝制及洪憲年號，對袁的評價亦甚高，說「元首不惜屈己從人以救中國，自是可敬。」⁷⁵

惲毓鼎對袁世凱態度的轉變，或許並非獨例。同樣在榮慶的日記中，也尊稱袁世凱、黎元洪(1864-1928)為總統、副總統，甚至到袁氏稱帝時，猶標記洪憲元年。⁷⁶那桐的情況亦復如此，日記寫著：「今日命令改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袁氏歿而黎氏繼任，還特別遣人往府宅祝賀。⁷⁷除了北方的清遺民外，身處上海的繆荃孫，在日記本來以干支紀年，後來也逕改洪憲元年，故可推知承認袁世凱稱帝一事。⁷⁸這些在「私我」的文字中共同反映某種「公我」的心態和現象：「反袁」未必全然為清遺民的想法，倒是認同君主帝制，仇視民國共和體制，才可能是他們最大的公因數。

五、結語

從惲毓鼎的《澄齋日記》可知，清季民初時期歷史人物的思想和態度，充滿著複雜交織的情境。對新／舊之間的更替和轉型，他們既體認時局不得不變，可是卻又始終堅持保有自己認可的價值。惲氏曾說「新學盛行，故富理想，然予終覺舊學深切有味也」⁷⁹，最足以代表這一代人物矛盾的心理。雖然誠如本文所述，惲反對新政改革，可是他自己也重視致用之具，購買新小說，甚至有意翻譯《大英百科全書》醫學書籍部分。⁸⁰不僅如此，惲還服膺梁啟超(1873-1929)的〈新民說〉，並通讀梁氏有關孟德斯鳩(Charles de

73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743。

74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749-752。

75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763、771。

76 謝興堯整理，《榮慶日記》，頁 233、270。

77 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頁 814、824。

78 李一華等編，《藝風老人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 2925。

79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335。

80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344-345。

Montesqueu, 1689-1755)、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 1809-1882)等介紹文章，⁸¹在在顯示他思想中亦有深具開明的一面。

同樣地，日記裏所見惲毓鼎的政治認同，其中複雜程度也遠遠超乎我們既有的認知。以做為一位清遺民來說，惲氏在私密性的日記寫下忠於清室的態度，這完全是我們在公開輿論和場合所無從得知的。然而，表達故國故君之思的同時，《澄齋日記》也揭露了身為清遺民公開的形象和處境。透過公領域的活動，惲毓鼎表現得既是無奈，也是不得不然。如果說忠貞清室的態度，只是惲氏屬於「私我」部分，那麼凸顯在公共場合進退維谷的處境，比喻為他在「公我」上的表現，亦不為過。當然，這樣「公我」與「私我」雙重出處之道，見諸於惲毓鼎等部分人物的日記中，未必能夠完整描繪清遺民的政治態度。然而我們從日記中呈現出來的政治認同與傾向可知，實際上清遺民之間立場的分歧，亦難以簡單劃分。唯有基於如此的認識，我們才足以明瞭他們在民初時期多次政爭(如張勳復辟、建立滿洲國)中，儘管心向清室，可是卻彼此態度和看法不一的情形。

81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381-382、386。

Analysis of Yun Yu-ding's Diary: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Qing Loyalists

Chih-hung Lin *

Abstract

Using the recently published *Diary of Yun Yu-ding* as a basis of discussion,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formation and attitude of Qing Dynasty loyalists in Beijing and Tianjin.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Yun Yu-ding rejected *xinzheng* (新政) promot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particularly its political and academic prospects regarding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is is a phenomenal complex, many loyalists considered it to be a crucial reason for the fall of Qing Dynasty. Moreover, as a Qing loyalist, Yun's diary also reflect his loyalty towards Qing Dynasty. If the diary is a reflection of the inner self, how should we interpret Yun's views on the politic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his interaction with the authorities?

Keywords: Qing loyalists, Diary of Yun Yu-ding, political identity, attitude

* Postdoctoral Studies,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Journal of Cross-Strait Studies

NO. 2

Analysis of Yun Yu-ding's Diary: the Political Identity of Qing Loyalists

Chih-hung L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December 2006**

**ISSN 1990-7540
GPN 2009501713**